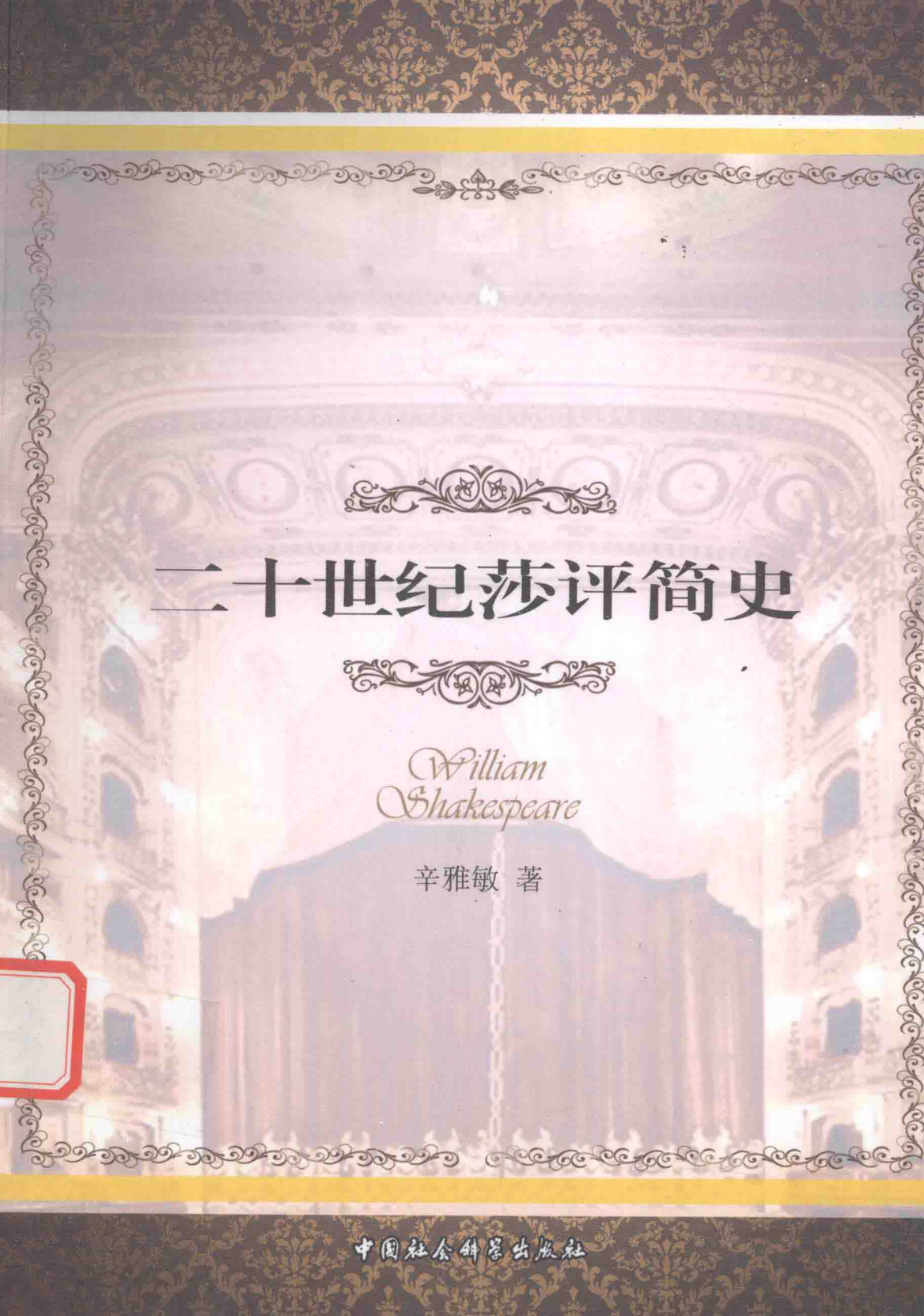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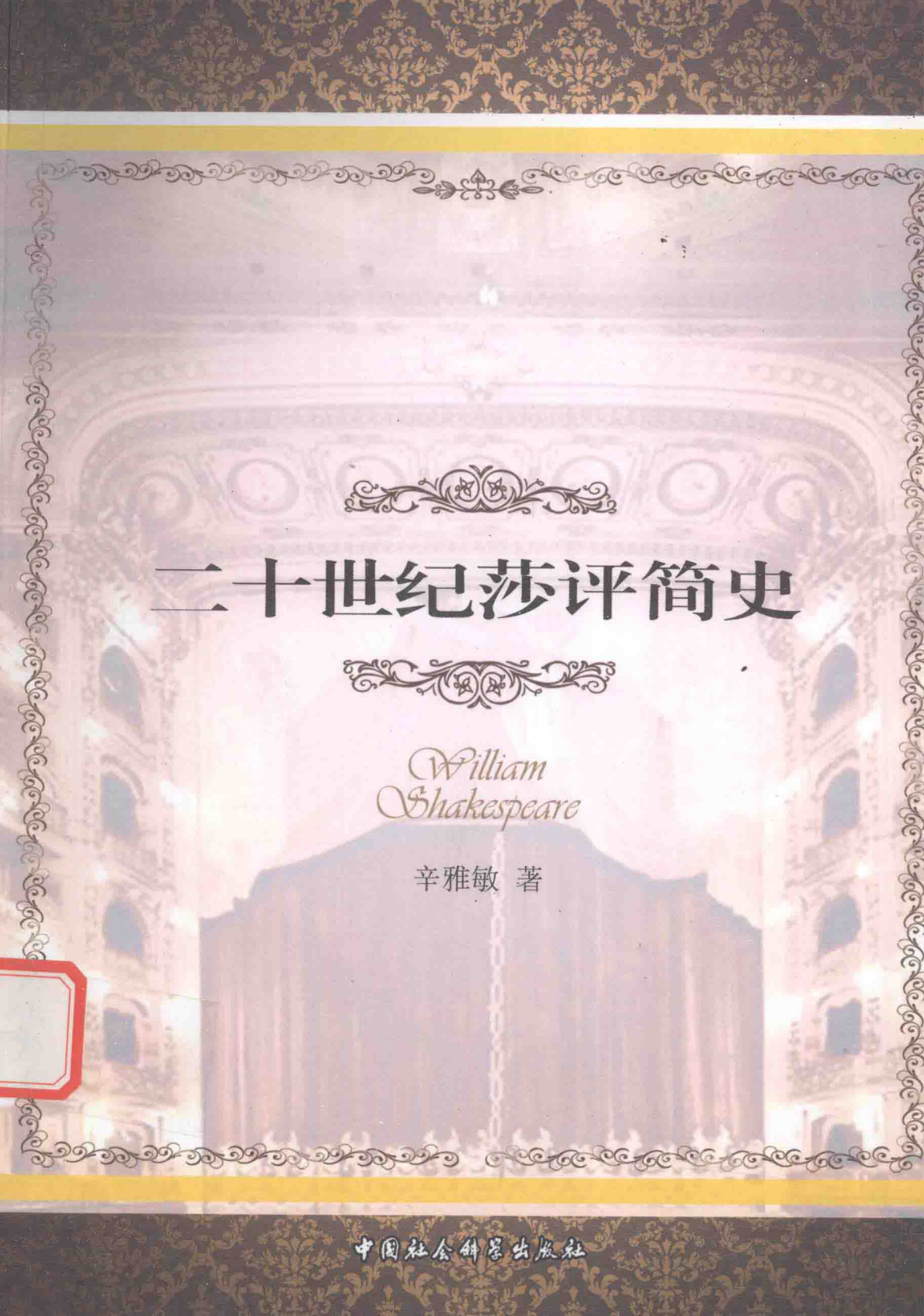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莎评简史



*William
Shakespeare*

辛雅敏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由郑州大学学位点建设基金资助出版

二十世纪莎评简史

William
Shakespeare

辛雅敏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莎评简史/辛雅敏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7-5161-8919-1

I. ①二… II. ①辛… III. ①莎士比亚(Shakespeare, William 1564-
1616)—文学评论 IV. ①I561.0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173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陈肖静
责任校对 牛 玺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5
插 页 2
字 数 213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绪 论

西方文学批评在 20 世纪得到了蓬勃发展，批评方法和批评流派丛生，可以说异彩纷呈、百花齐放，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文学现象的认识和理解。而另一方面，在整个西方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恐怕没有哪位作家像莎士比亚一样受到世人瞩目。莎士比亚在西方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催生了绵延数百年的莎学（Shakespeare Study）。但我们常说的莎学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传统意义上的莎学不仅包括莎士比亚批评（Shakespeare Criticism），或称莎士比亚评论，可简称为莎评；也包括莎士比亚学术研究（Shakespeare Scholarship），后者则可被认为是狭义上的莎学。这一区分涉及长期以来西方文学研究中学者和批评家之间的不同分工。莎士比亚学术研究是学者们的专门领域，其中的版本校勘、故事来源、历史背景等研究都需要长期和专门的学术训练及知识储备；而莎士比亚批评或评论则是文学批评家们的工作，我们所说的莎评史可视为西方文学批评史中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所关注的对象是莎士比亚批评或莎士比亚评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莎评，并不包括莎士比亚研究中狭义上的莎学。那么作为对历史上的莎士比亚批评的研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如果每个人都有权描绘出自己眼中的哈姆莱特，为什么我们还需要了解前人的批评实践？简言之，研究莎评史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托·斯·艾略特（T. S. Eliot）曾在一篇名为《莎士比亚批评——

从德莱顿到柯尔律治》(Shakespearian Criticism: From Dryden to Coleridge) 的文章中回答过这个问题:“评价如莎翁一样伟大的诗人,需要借别的诗人、评论家的观点来帮助理解。而每一种观点又都是不完美的。要理解这些观点还需要我们对文学批评的整体观念有所理解。”^①这段话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阐明了莎评的重要性;二是指出了文学批评与莎评的关系。

这两层意义便是本书的价值所在:一方面,如艾略特所言,以往的莎评是当代莎评的基础(sub-structure),阅读其他批评家的作品就是和他们对话,而整个莎评史就是一个莎评家之间不断对话的过程。莎评史研究可以让我们了解历史上批评家是如何评价莎士比亚的,进而让我们在今天更深入地理解莎士比亚作品。而另一方面,自从18世纪以来,莎士比亚批评就开始多次成为西方文学批评发展史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在文学风尚的变革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对莎士比亚批评史进行研究梳理也可以让我们从一个侧面观察整个西方文学批评的发展轨迹,而对整个文学批评的把握也有助于我们认识每一位莎评家的不足。

进入20世纪以后,文学批评的发展逐步走向多元化、专业化和制度化,随着这一进程的深入,新的批评方法不断出现,新的批评理论也开始崭露头角。在这样的背景下,莎士比亚批评再次成了各种批评方法的试验场。从人物心理分析到历史主义、形式主义,再到70年代以后的各种经过不同文学理论浸染的批评阵营,莎士比亚批评在20世纪不仅一次次地运用新的批评方法,将研究不断推向深入,将问题不断细致化,从而完成了对自我的不断超越;同时它也像以往的莎评一样,完美地融入了整个文学批评发展的大潮之中,并时不时成为引领一时风尚的弄潮儿。这一切都使得20世纪莎评比以往的莎评更加值得

^① T. S. Eliot, "Shakespearian Criticism: From Dryden to Coleridge", in Harley Granville-Barker and G. B. Harrison, eds. *A Companion to Shakespeare Stud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6, p. 288.

我们学习和借鉴。

但是，作为一个史论性质的研究，在有限的篇幅内，要做到既全面又深入地研究 20 世纪如此众多的莎评家，似乎不太可能。因此，本书旨在尽量客观地勾勒出 20 世纪莎评的整体风貌，我们无意于、也没有能力在有限的篇幅内对莎评史做事无巨细、通览无余的考察，而只能是选取最具代表性的莎评家进行总结，并勾勒出一个历史发展和思想传承的大致轮廓。因此，如何权衡全面介绍与深入评析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面对这一问题，本书将选取最有代表性的重要批评家进行相对细致深入的评析，同时试图兼顾文学批评发展的宏观背景，尽量选取能够体现莎评乃至文学批评发展脉络的代表性人物进行研究，目的在于在有限的篇幅内对 20 世纪莎评史上的重要人物做出有价值的介绍与评价。然而即便如此，由于精力、学识、篇幅等原因，仍有大量非常重要的莎评家没有在这本简史中得到应有的讨论，已经讨论的莎评家中也难免出现纰漏和错误，对此还望学界同仁海涵并指正。

总而言之，歌德对莎士比亚的著名评价——“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可以被视为莎士比亚批评常释常新、永无止境的真实写照。只要文学批评还会不断地推陈出新，莎士比亚批评的生命力就不会枯萎。同时，只要莎士比亚批评不断地向前发展，莎评史的研究便自有其价值。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人物心理批评:性格分析与精神分析	(1)
第一节 布拉德雷	(2)
第二节 精神分析莎评	(16)
一 弗洛伊德	(16)
二 琼斯	(29)
第二章 历史主义批评:莎士比亚与伊丽莎白时代	(37)
第一节 文学与戏剧传统	(38)
一 斯托尔	(39)
二 许金	(50)
第二节 伊丽莎白时代的心理学与人性论	(61)
一 坎贝尔	(61)
二 斯宾瑟	(73)
第三节 蒂利亚德	(85)
第三章 形式主义批评:意象、象征、原型	(104)
第一节 意象批评	(105)
一 斯珀津	(105)

2 二十世纪莎评简史

二 克勒门	(112)
第二节 从意象到象征	(122)
一 利维斯与《细察》派莎评	(123)
二 艾略特与新批评	(135)
第三节 从象征到原型	(149)
一 奈特	(149)
二 弗莱	(164)
 第四章 政治文化批评:从边缘到中心	(175)
第一节 从解构到意识形态	(176)
第二节 新历史主义莎评	(186)
第三节 文化唯物主义莎评	(195)
第四节 女性主义莎评	(208)
 结论	(221)
参考文献	(229)

第一章 人物心理批评：性格分析与精神分析

20 世纪初的莎评，基本上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传记研究与性格分析批评的延续。在这方面，1904 年布拉德雷教授出版的《莎士比亚悲剧》一书把这一传统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此书中他把戏剧人物当做 19 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人物，将浪漫主义以来的莎剧人物性格分析发展到极致，深入细腻的分析 and 娓娓道来的笔法让《莎士比亚悲剧》一书独具魅力，成为有史以来最畅销的莎评专著；但同时，此书的成功也预示着莎评界的变革即将来临，新的批评方法已经在黎明的曙光中蠢蠢欲动。

世纪之交，来自德语世界的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发展也给文学批评带来了新的变化，一向作为西方文学批评风向标的莎士比亚批评这次也一如既往地站在了变革的前沿。除了弗洛伊德本人对《哈姆莱特》等莎剧的论述外，其弟子厄内斯特·琼斯的《哈姆莱特与俄狄浦斯》一书更是成为精神分析莎评的典范。虽然精神分析莎评一直也未能在莎士比亚评论的舞台上占据中心位置，但却从未离开过这个舞台。直到 20 世纪末，由于拉康等人的复兴，这个长盛不衰的批评流派依然是莎评中的一个重要阵地。

性格分析与精神分析，虽然一新一旧，却都在 20 世纪初找到了自己的最佳代言人，而且两者都可视为以人物心理分析为核心方法的批

评流派，只不过布拉德雷更倾向于诉诸人类的常识心理，而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使用的则是由弗氏本人所开创的、从精神病理学进入文学研究的精神分析方法。本章将以布拉德雷为代表的性格分析莎评和以弗洛伊德和琼斯为代表的精神分析莎评放在一起，以期展现 20 世纪初西方莎评界的大致风貌。

第一节 布拉德雷

英国莎评家、牛津大学教授安·塞·布拉德雷（Andrew Cecil Bradley, 1851—1935，又译布雷德利）是一个在西方莎士比亚研究领域家喻户晓的名字，他的代表作《莎士比亚悲剧》（*Shakespearean Tragedy*）一书堪称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莎评著作。这部书出版于 1904 年，它在专业和业余读者中都广受欢迎而又历久弥新，在 2005 年版权过期之前就已经再版和重印达到 100 次以上，平均每年都有重印，堪称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布拉德雷之所以能够在文学批评史上青史留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诗歌理论和悲剧理论。前者体现在他的《为诗而诗》（*Poetry for poetry's sake*）以及其他演讲小册子中^①，后者则体现在被收入《牛津诗歌演讲集》（*Oxford Lectures on Poetry*, 1909）中的《黑格尔的悲剧理论》（*Hegel's Theory of Tragedy*）一文和《莎士比亚悲剧》一书的前两章。因此，布拉德雷的身份不仅是批评家，同时也是一个文学理论家，他的诗歌理论和悲剧理论在西方文论史上都有一定的影响，他的莎士比亚评论其实也远比单纯的浪漫主义性格分析要更复杂。要讨论布拉德雷的莎评，就要先从他的悲剧理论开始。

布拉德雷的悲剧理论的价值在于他改造了黑格尔的相关理论并使

^① 这些小册子包括《为诗而诗》、《诗的功用》（*The uses of poetry*）等，前者被收入《牛津诗歌演讲集》。

其能够解释莎士比亚。众所周知，黑格尔心目中的理想悲剧是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而不是近代的莎士比亚。在《黑格尔的悲剧理论》一文中，布拉德雷便试图补充黑格尔的理论。首先，他肯定了黑格尔关于悲剧是精神冲突的说法，认为悲剧是伦理实体的自我分裂与内部斗争，是善与善之间的冲突；而悲剧的结局就是对这两种排他性要求的否定，是冲突的和解。然后，他把黑格尔对近代悲剧的一些论述进行了进一步解释。黑格尔认为，“赋予主体以重要性”^①是近代艺术的显著特征，布拉德雷则沿着这一论断进行展开，为近代悲剧辩解道：

希腊悲剧中的人物，由于和一种伦理的力量化为一体，令人深感兴趣，这种兴趣在近代悲剧中虽然丧失了，可是通过对人物的异常细腻的描绘，通过人物对某种特殊的魅力或者俯瞰一切的优点的取得，也就得到了补偿。^②

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布拉德雷试图进一步补充黑格尔的悲剧理论。他指出，黑格尔在几个方面还需要补充。首先，布拉德雷认为，黑格尔看重的是行动和冲突，而非苦难和厄运，但如果厄运来自于人物的行动，那么这种厄运就是具有悲剧性的。除了来自行动的厄运，还有一种意外和偶然因素带来的厄运，这种厄运带有一定的命定色彩，如果与人物性格结合也会成为很好的悲剧素材。其次，布拉德雷指出，黑格尔有时夸大了悲剧结局的和解因素，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全面的和解是不可能的，悲剧的结局还会给人带来痛苦，甚至有时有一种崇高感和喜悦感。^③

^① [英] 布拉德雷：《黑格尔的悲剧理论》，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卷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1557页。

^② 同上书，第1558页。

^③ 在这里，布拉德雷衡量黑格尔理论的标准是“我们的感觉”，这和他《莎士比亚悲剧》中使用的方法是一致的。总的来说，布拉德雷对黑格尔的改造整体上都是带有经验主义色彩的。

最后，他还认为黑格尔对道德的邪恶认识不足。

经过这一系列补充，布拉德雷最后将悲剧重新定义为：“悲剧描写的是精神的一种自我分裂和自我耗损，或者是含有冲突和耗损在内的精神的一种分裂。”^① 这一定义最大的特点就是体现了黑格尔所忽略的主人公的内部冲突，并且引入了“耗损”这个概念。而且布拉德雷进一步指出，“精神价值越高，冲突和耗损的悲剧性也就越大。”^② 总之，布拉德雷对黑格尔的补充和改造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使黑格尔的悲剧理论能够适应近代悲剧，尤其是莎士比亚悲剧。单就此目的而言，应该说这种改造还是成功的。

在《莎士比亚悲剧》一书中，布拉德雷以莎士比亚悲剧为基础，进一步探讨了悲剧的概念和本质等问题，其中很多问题可以视为对《黑格尔的悲剧理论》一文的补充和延续。比如他明确指出，莎剧中的冲突不仅仅是两个势力之间的冲突，更是主人公内心的冲突。而且布拉德雷在这里将“精神势力”进行了定义，称其为“人的精神中起作用的任何一种势力，不论是善是恶，是个人的情欲还是和个人无关的原则；怀疑、愿望、顾虑、观念等任何可以激励、震撼、占有和驱使人的灵魂的东西。在莎士比亚悲剧中，类似这样的势力发生着冲突”。^③

关于悲剧的本质，布拉德雷说道：“悲剧的根本力量是一种道义的法则。”^④ 但这种道义既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正义和仁慈，也不能简单地被看做是命运；因为前者会使个人的悲剧结局成为其行为的必然结果，后者则会使个人变为某种冷漠力量纯粹的牺牲品。这种“道义的法则”是一种善与恶之间的斗争。恶在世界秩序的内部产生，与善

① [英] 布拉德雷：《黑格尔的悲剧理论》，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卷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1564页。

② 同上书，第1567页。

③ [英] 安·塞·布雷德利：《莎士比亚悲剧》，张国强、朱涌协、周祖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

④ 同上书，第28—29页。

发生冲突。世界秩序在努力排斥恶并战胜恶的时候不得不割舍自己实体的一部分,于是善与恶一起牺牲。布拉德雷的这一论述很精彩,但却十分抽象,并且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不过,布拉德雷自己也说,悲剧本身就是一个痛苦的谜。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布拉德雷在《莎士比亚悲剧》中进一步发展了在《黑格尔的悲剧理论》中还不太明显的“性格即命运”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改造对象是亚里士多德。虽然布拉德雷表面上承认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观点,即“行动”是悲剧的主要因素,但同时又指出,这些行动“不是‘睡意朦胧间’所干的事情,而是足以体现行动者性格特征的作为或不作为,即表现性格的行为。因此,我们同样真实地把悲剧的中心说成是性格产生的行动,或者说成是导致行动发生的性格”。^① 我们知道,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事件的组合是成分中最重要的,因为悲剧摹仿的不是人,而是行动和生活。……所以,人物不是为了表现性格而行动,而是为了行动才需要性格的配合。由此可见,事件,即情节才是悲剧的目的。”^② 这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组成要素中行动第一,人物第二。布拉德雷在这里把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中行动与人物的关系悄悄地换了位置,人物性格成了行动的根源,于是,“性格即命运”也就代替了情节至上的古典悲剧理论。这样一来,用人物性格来分析莎士比亚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布拉德雷曾说,莎士比亚塑造的最出众的四个人物按出现的先后顺序应该是福斯塔夫、哈姆莱特、伊阿古和克莉奥佩特拉,而且这其中“哈姆莱特和伊阿古这两人问世年代间隔最近,也最难以捉摸。”^③ 因此我们便先以哈姆莱特和伊阿古为例感受一下布拉德雷的性格分析的特点。

① [英] 安·塞·布雷德利:《莎士比亚悲剧》,张国强、朱涌协、周祖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②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4页。

③ [英] 安·塞·布雷德利:《莎士比亚悲剧》,张国强、朱涌协、周祖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页。

像许多前辈批评家们一样，布拉德雷认为《哈姆莱特》的核心问题就是哈姆莱特的延宕问题，而这种延宕无疑来自于哈姆莱特的性格。只有理解了哈姆莱特独特的性格，才能理解这个让人感到耸人听闻的悲剧。在阐述自己的观点之前，布拉德雷总结了他所认为的几种流行的错误见解。首先，将延宕归因于外部的困难是说不通的，因为哈姆莱特不仅对这些困难只字不提，而且还说过“现在我明明有理由、有决心、有力量、有方法，可以动手干我所要干的事”。（第四幕第四场）^① 其次，如果延宕是由于内部困难，那么这种困难并非来自伦理道德方面——无论这种道义上的困难是明显的还是潜意识中的。再次，布拉德雷认为哈姆莱特是一个有英雄气概的人物，所以延宕并不是因为他的多愁善感和脆弱无能所致。最后，就是影响最大的施莱格尔和柯尔律治的观点，即认为延宕植根于哈姆莱特的犹豫不决，而犹豫不决则植根于过于强大的理性和过度的思想。相对于前面几种解释，这种解释更贴近文本，因此也更合理一些。但布拉德雷还是认为一个思虑过多的哈姆莱特和我们心目中那个英雄人物有一定的差距，而这种对哈姆莱特英雄形象的损害也正是这种解释的问题所在。

在布拉德雷看来，过度的思虑在后期的哈姆莱特那里只是他那种独特精神状态的一种表现，而不是其原因。哈姆莱特延宕的直接根源是“由特殊的情况造成的一种极不正常的思想状态——一种压抑忧郁的状态”。^② 造成这种特殊情况的原因不仅仅是他父亲的死，更重要的是他母亲的乱伦。“根源是他母亲的本质被突然暴露了出来，使他在道德上感到十分震惊，而这时他的心中又正好充满了失去亲人的哀痛，他的身体也无疑因悲伤而变得虚弱了。”^③ 身体的虚弱还是次要的，关

① [英]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9页。以下莎剧引文如未特殊注明，均出自这一版本，因此只在括号内标注场景，不再单独注明出处。

② [英] 安·塞·布雷德利：《莎士比亚悲剧》，张国强、朱涌协、周祖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97页。

③ 同上书，第107页。

关键在于哈姆莱特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变化，一种病态的厌世感出现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因为哈姆莱特的性格中有三个方面存在着潜在的危机，这些危机在上述的特定情况下发展成了这种病态的忧郁。首先，哈姆莱特在性情上本不忧郁，但却有一种会导致感情剧烈变化的不安定因素，并会在某段时间里沉浸于一种感情中，这种性情埋下了能发展成忧郁的种子。其次，他性格中有一种疾恶如仇却又敏感的道义感，这种道义感如果遇到生活的打击会导致悲剧。最后，哈姆莱特非凡的才智使他善于归纳现象并常常刨根问底，这种思维习惯在受到打击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产生一个恶性循环：当突然的变故使他陷入忧郁时，“他的善于想象和把具体事物普遍化的习惯，很可能把这一震动带来的后果扩展到他的整个身心和思想中去。”^①而随之而来的更多的思考则进一步打击了他的决心，使他深陷其中无法自拔。道义感和过人的才智本来是哈姆莱特的优点，但当突变来袭的时候，这些优点却都变成了他的敌人。“一个缺乏强烈道义感的人，对这样可怕的发现是不会那么痛心的。一个思想没那么敏捷、豁达、善于探索的人，也许不会让那种厌恶和怀疑在他的整个头脑中蔓延滋长。”^②总的来说，哈姆莱特本来是一个英雄人物，但现在却由于来自环境变化的连续打击变成了一个忧郁症患者。

布拉德雷认为，这种忧郁症理论比施莱格尔和柯尔律治的理论更复杂，更能说明剧中许多难以解释的现象。由于忧郁的作用，哈姆莱特开始厌恶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生活中的一切，而这就是他延宕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忧郁的状态能够解释其他理论解释不了的现象，比如哈姆莱特为何时而消极等待，时而劲头十足；时而急躁不安，时而冷酷专注；甚至有时歇斯底里式地任由情感发泄。但是，究竟心理学的忧郁理论是如何解释这些症状的，布拉德雷却语焉不详，甚至干

① [英] 安·塞·布雷德利：《莎士比亚悲剧》，张国强、朱涌协、周祖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页。

② 同上书，第108—109页。

脆说道：“如果这个剧本的读者读过精神病专著中有关忧郁症的症状，他们中的许多人就能更好地理解这出戏。”^① 这也是布拉德雷的哈姆莱特性格分析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必须承认，对于性格分析方法来说，伊阿古是一个比哈姆莱特更难处理的人物。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历史主义莎评家斯托尔从戏剧传统出发，只要一句“必要时候对恶人的相信”就解释了全剧大部分的矛盾；而由于站在性格分析的角度，布拉德雷却要费尽心机地为伊阿古的每一句台词寻找人物性格上的合理解释，并要解释奥赛罗如何由于性格原因而最终相信伊阿古的诡计。不过他也很明智地指出，虽然其他人物都相信伊阿古，但是作为读者，我们千万不能轻信伊阿古自己的台词，因为他会有意（或无意）地对周围人撒谎。^②

对于伊阿古的性格，布拉德雷还否定了柯尔律治的“无动机的恶意”一说。他认为伊阿古的骗局并非出于一种恶意，而是因为他对别人产生了憎恨，或有人妨碍了他的行动。布拉德雷眼中的伊阿古智力超群，意志力、洞察力、应变能力一流，但他同时也冷漠无情、缺乏人性，信奉利己主义。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特别在意自己的自尊心和优越感。我们在这里不妨看一下布拉德雷对伊阿古这种心理状态的细致描绘：

不管怎么，只要触动了他的优越感，伊阿古马上就会感到浑身不自在。就此而论，他的竞争意识极为强烈。这就是任命卡西奥为副将使他愤怒的原因，也解释了他为何迁怒于爱米莉亚。伊阿古并不爱自己的妻子，可他惟恐他人占了便宜，给自己戴上绿

① [英] 安·塞·布雷德利：《莎士比亚悲剧》，张国强、朱涌协、周祖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页。布拉德雷并不否认哈姆莱特的精神状态与精神疾病之间的关系：“假如病理学家把他的这种状况叫做忧郁，甚至进一步去确定是哪一种忧郁症的话，我并不要加以反对；相反，我倒是要感激他，因为他强调了哈姆莱特的忧郁不是什么普通的精神压抑这一事实。”

② 同上书，第195页。

帽子，使他成为怜悯或嘲讽的对象，这便是他的烦恼所在。由于他确信女人个个都是水性杨花，因此莫名的恐惧每时每刻都伴随着他。出于同样的缘由，他也憎恨男子的美德。他憎恨德行，并不是因为他嗜爱邪恶。首先，伊阿古认为这不是美德，而是愚蠢。其次（虽然他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德行削弱了他的自满心理，动摇了他利己主义天经地义的信条。^①

于是，在伊阿古眼中既无情感也无道德，甚至世界在他眼中也是颠倒的，“还有几分头脑”（第一幕第一场）的人成了仆人，愚蠢的人则名利双收。这一切不仅大大伤害了伊阿古的自尊心，也使他成了美德的对立面。这些原因相结合，就促成了伊阿古作恶的动机。与哈姆莱特无意识的延宕一样，这种动机是一种无意识的动机，“伊阿古自己也搞不清楚究竟是什么煽起了他的欲望”，^②所以他才会编造各种自相矛盾的理由来解释自己的动机。

但是，有了动机并不一定会作恶。要回答伊阿古为何作恶的问题，布拉德雷认为，伊阿古这种人“最大的乐趣就在于满足自己的权欲和优越感，其次是让他充分施展才能，寻求冒险刺激。这三者加在一起，他的乐趣就达到了顶点。”^③在这种情况下，卡西奥的升迁是一个导火索，将原本并无太大野心的伊阿古行恶的欲望激发出来，这才导致了后来一系列的悲剧。

从以上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布拉德雷的性格分析细致入微，比以往的莎评家更加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且他引入了一种人物性格在某种统一性原则下动态发展的观念，从而修正并发展了传统的浪漫主义莎评；但同时他把戏剧人物当做真人来做心理分析，用读现实主义

① [英] 安·塞·布雷德利：《莎士比亚悲剧》，张国强、朱涌协、周祖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03—204页。

② 同上书，第210页。

③ 同上。